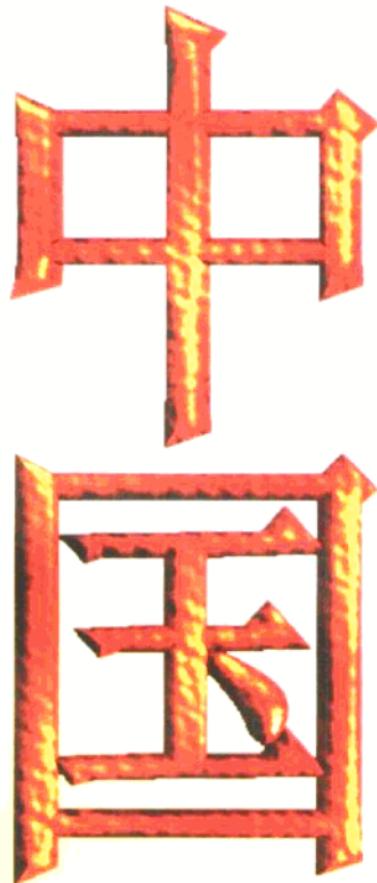


国家起源及形成

• 高光晶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	(7)
第一节 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环境	(8)
第二节 五千年间黄河流域的气候	(12)
第二章 传说中氏族部落在黄河中下游的分布	(16)
第一节 黄帝部族	(17)
一 “黄帝”一词的由来	(17)
二 祀姓尧部落	(21)
三 姝姓夏部落	(26)
四 姬姓弃部落	(31)
第二节 炎帝部族	(34)
一 “炎帝”一词的由来	(34)
二 太岳有邰氏	(38)
三 炎帝共工氏	(41)
第三节 东夷部族	(45)
一 “东夷”一词的由来	(45)
二 风姓太皞部落	(48)
三 少皞部落	(50)
四 蚩尤部落	(53)
五 高阳氏颛顼部落	(56)
六 姅姓舜部落	(58)
七 子姓契部落	(61)

第三章 四千年间黄河中下游的社会阶段	(66)
第一节 龙山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	
——与考古学界的商榷	(67)
一 关于“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问题	(67)
二 关于“贫富分化”的问题	(71)
三 关于阶级的产生	(75)
四 关于“掠夺战争盛行”的问题	(79)
第二节 图腾崇拜	(82)
第三节 氏族部落名称的改换	(86)
第四节 尧、舜治水时的农业生产	(91)
第四章 防治洪水组成的部落联盟	(102)
第一节 尧、舜时洪水泛滥成灾的原因	(103)
第二节 部落联盟的形成	(108)
第三节 尧时鲧主持治水的失败	(112)
第四节 舜时禹主持治水的成功	(117)
第五章 以暴力建立的部落联盟	(126)
第一节 禹的权力扩张	(126)
第二节 夏启采用暴力夺取部落联盟盟主的职位	(137)
一 启、益争夺联盟盟主职位的斗争	(137)
二 启对部落联盟盟主职位的巩固	(142)
三 部落联盟的变化	(147)
第三节 夏代的部落联盟	(154)
一 夏代的势力范围	(154)
二 夏部落各氏族的分布	(159)

三	部落联盟内的异姓部落.....	(172)
四	后世对夏代部落联盟的传说.....	(174)
第四节 夏启子孙对部落联盟盟主职位的继承.....		(199)
第六章 部落联盟的更替		(212)
第一节 新部落联盟的形成.....		(212)
一	以夏部落为盟主的部落联盟的衰落.....	(212)
二	以商部落为盟主的部落联盟的形成.....	(222)
三	新旧部落联盟的争斗.....	(237)
第二节 部落联盟的继续.....		(249)
一	“王位”继承权争夺的原因.....	(249)
二	“王位”继承权的争夺.....	(254)
三	商前期的官职.....	(266)
第七章 中国国家的起源——官僚机构的初建		(270)
第一节 商后期最高统治者称		
“王”		(270)
一	对“王”源流的探索.....	(271)
二	“王”是“士”的转化.....	(279)
三	“王”字的规范化与初义.....	(286)
四	“王位继承”的变化.....	(290)
第二节 官僚机构的初建.....		(300)
一	卿事寮——商代外廷机构之一.....	(301)
二	太史寮——商代外廷机构之二.....	(307)
三	商代的内廷官.....	(311)
第三节 商后期的地方组织.....		(318)
一	“方”的含义.....	(319)
二	“方国”的分布.....	(324)

第四节 商代的社会结构	(337)
一 “方国”的社会结构	(337)
二 王室的社会结构	(338)
第八章 中国国家起源的继续	(352)
第一节 周沿袭商建立的官僚机构	(353)
一 周代封国联盟盟主称“王”	(353)
二 “王位”的继承	(354)
第二节 中央的官僚机构	(358)
一 卿事寮——周代外廷机构之一	(358)
二 太史寮——周代外廷机构之二	(363)
三 周代的内廷官	(371)
第三节 周代的地方组织	(380)
一 “方国”联盟的解体	(380)
二 封国联盟的建立	(388)
第四节 周代的社会结构	(394)
一 王畿的生产方式	(395)
二 “封国”一词的原义	(399)
三 商代“方国”沦为戎狄	(403)
第九章 封国联盟的继续——春秋	(411)
第一节 封国国君的称号	(412)
第二节 封国内的中央官制	(418)
一 鲁国	(420)
二 齐国	(422)
三 晋国	(424)
四 郑国	(427)
五 宋国	(428)
六 楚国	(430)
第三节 春秋时的地方结构	(433)

一	商代的“方国”沦为夷狄.....	(433)
二	封国统治层的社会结构.....	(450)
第十章 中国国家的形成		(478)
第一节 战国以前原始社会结构下的		
	社会组织.....	(478)
一	传说中夏及其以前的地方组织.....	(479)
二	商代的地方组织.....	(482)
三	周代的地方组织.....	(485)
四	春秋时的地方组织.....	(496)
第二节 战国时社会结构变革的		
	原因.....	(513)
一	统治者剥削的加剧.....	(514)
二	政治改革的强制.....	(516)
三	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	(520)
四	亲属间道德观念的变化.....	(524)
第三节 战国时的地方行政组织.....		(527)
一	人口的迁徙与杂居.....	(528)
二	地方行政组织的建立.....	(534)
三	户籍制度的创设.....	(540)
第四节 战国时“公共权力”机构的		
	设置.....	(542)
一	国家最高统治者称号的变更.....	(543)
二	官僚制度的组建.....	(545)
三	官僚机构的确立.....	(552)
第五节 军事制度的改建.....		(559)
一	商、周至春秋时的部落兵制.....	(559)
二	军队性质的变化.....	(574)
第六节 由刑罚到刑法的转变.....		(581)

一	商、周时的刑罚	(582)
二	春秋战国时的“法”	(601)
结语		
一	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国家形成 快慢的原因	(613)
二	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国家形成 后的各自特色	(619)
后记		(634)

前　　言

中国国家产生于何时？历来意见分歧。孔子认为：中国国家最早是唐尧建立的。他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又说：“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此后，儒家沿袭此说，故《孟子·万章》说：“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同时，墨子从尚贤的主张出发，提出尧、舜、禹的帝位是禅让，将中国国家的产生也定于唐尧。

与此同时，有人在承认唐尧、虞舜两朝外，把中国国家最早建立的功劳归之于黄帝。战国齐宣王时，稷下学者编写的《管子》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法法篇》）魏襄王时编写的《竹书纪年》也是从黄帝开始的。可是，庄子却把中国的文明时代延伸到燧人、伏羲时。《庄子·缮性》说：“燧人、伏羲始有天下。”不过，这种看法未被接受，只是黄帝是中国文明时代开始的第一代帝王流传较久，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宋代金石文的研究者。

近代，学者们在考证的基础上，认为黄帝、唐尧、虞舜，以至夏代的史实与君王，除夏桀外，都是两汉人因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神话故事（《古史辨》）。这样，有人对此无所适从，只好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回避，不仅是对黄帝、唐、虞、夏，甚至涉及商、周与春秋、战国。例如：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从秦统一开始，将秦以前的历史“付之阙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也将夏、商、周定为“传疑时代”。

但有人在探索这段历史中，除利用文献资料外，更注重甲骨卜辞、金文的记载和考古发掘，以及摩尔根的著述《古代社会》等资料，因处于探索的开始，还不能如实揭开中国古史的面貌。因此，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才开始。商代的产业是以畜牧为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

后来，他又改变了这一看法。吴泽在《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序》中，提到他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均以殷代为古代奴隶社会，殷前的夏代为史前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后的周代是中世封建制社会。”

此后，学术界对中国古史的探索虽有所进展，但对盘庚迁殷之前还是模糊不清，特别是夏史。所以，直至1973年，史学界的权威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指出：关于夏代的情况，我们今天还不能多说，要等待日后从地下获得更多的资料去说明。因此，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将“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和产生了阶级”的夏代，“看作原始公社正在向奴隶制度国家过渡”，不能“看作奴隶制国家已经完全成立”，只有商代才能“确定为奴隶制度的社会”。但是，有关商代前后期的社会性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王玉哲在《中国上古史纲》中指出：不仅是夏代，就是商代的前期，也还是“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只有在盘庚迁殷后，“才逐渐地过渡到奴隶制社会”。

郭沫若尽管不能确定夏代的社会性质，但在“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政治影响下，当他主编《中国史稿》时，也只得将中国文明时代或奴隶制时代提前到夏初开始。从此，学术界不管是发表的有关论文，还是出版的中国古史专著，都以此说为准则，将中国国家的产生定于夏初。在大汶口遗址有“文字”的陶器出土后，唐兰提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即文明时代应延伸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却招来众多的非议。当然，学

学术界对学术问题发生争论是正常现象，但众人对这一问题却完全相同，即中国国家形成于夏初，似乎已成定论，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因为，论者有的以传说为依据，有的以考古发掘的零碎资料为凭证，而且都是将国家简单地理解为暴力机构，甚至不去认真探讨夏代是否已建立暴力机构，却认为有暴力就有机构。在阐明夏代国家机构产生的问题上，又都片面地利用传说，而这些传说，又多是后人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而附会夏代的。例如：春秋战国时人以晋国六军附会夏后启时的六军进行“甘之战”的。

同时，这种暴力或权力，固然可以用于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但也可以用于阶级产生之前的氏族部落对氏族部落的压迫。如果要将这种暴力看作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首先就要论述阶级的产生。尽管有的著作谈到中国的阶级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但对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殷本纪》中，以“氏”为夏、商时的社会组织单位，而《周本纪》与夏、商二纪不同，不以“氏”为社会单位的问题，却视而不顾。

阶级不是建立在氏族公社的结构之上，而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解体，个体小家庭出现贫富分化后产生的。夏时的部落联盟、商时的方国联盟和周时的封国联盟，都是建立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中国的氏族结构，直至春秋晚期，特别是战国时才逐渐解体。商自盘庚迁殷开始，在子姓部落的基础上建立暴力机构，直至周时完成。但这种暴力机构是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其所压迫的也是氏族部落，只不过是其征服的异姓氏族部落。如果要将这种压迫看作阶级压迫，那么这种阶级与我们所说的阶级根本不是一回事。若要将这种暴力机构看作国家，那这种国家只能是原生形态，是中国国家产生的初级阶段。

其次，国家与旧氏族部落组织不同的是，除行使公共权力即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职责或暴力机构设置外，还有“按地区划分

它的国民”。这种划分，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氏族结构破坏的情况下，形成以地域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时出现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以血缘关系性质的社会组织，建立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之上，是氏族社会。其管理机构与个人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这种关系，纯粹是人身性质的。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地域与财产的基础之上，是政治社会。在这里，管理机构与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地域的乡、县、州和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种关系，纯属地域性的。所以，他在探讨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在论述氏族公社管理机构转化为公共权力或暴力机构的同时，也论述其血缘部落即氏族公社，转化为地域部落即农村公社，以及阶级在个体家庭的贫富分化中产生出来的情况。

或者有人会认为：世界各民族有着许多差异，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时，就不应因袭 19 世纪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马克思根据东、西方古代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提出“东方形态”与“古典形态”，或“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和“古代（典）的所有制形式”。由此看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是不同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说二者不同有：

一、亚细亚的“共同体（指农村公社——引者）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古典的个人虽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成员，但他们居住在城市内，耕地为城市的领土，社会经济除农业外，还有独立的手工业、商业，使他们不成为公社的附属物，有其独立性。

二、亚细亚的人们散居于广阔的农村，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组成很小的村落，组织涣散。古典的是“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住宅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三、亚细亚的“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古典的“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独立耕作的那块土地——特殊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

四、亚细亚是以“公社制度为基础”的。公社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所以，“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古典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因此，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都是属于公社成员私人所有的，他们不满足于自给自足，而追求发家致富。^①

所以，东西方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出现两种不同的形成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中指出：东方形态阶级形成的过程与古典形态阶级形成的过程虽有区别，^②但无论东方形态或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还是古典形态或“古代的所有制形式”，阶级的产生与国家的形成，都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公社解体后，个体家庭组成以地域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时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国家不同旧的氏族组织的两种理论，是符合古今中外国家形成的普遍规律和国家概念的，那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2—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么，因袭或根据这种理论观点，来探索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又何尝不可呢？！

翻开世界各国的历史，其古代国家的形成，无不都是公共权力或暴力机构，是和“按地区划分其国民”而产生的阶级同时形成的，并成为国家区别于氏族组织的两大要素。这样，在论述国家起源及形成时，就不能顾此失彼，如此，国家概念才能完整，统一于后来的和近、现代的国家概念。

不错，东西方最早建立国家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产生国家的过程，以及国家形成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不尽相同，但“国家”或“国”的这一概念是相同的。就目前而论，世界各国之间尽管千差万别，但设立公共权力或暴力机构和“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

据最近修订，于199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国家”条下说：“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恩格斯指出：国家具有和民族组织不同的以下特征：第一，不是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地区划分和组织它的国民；第二，设立了公共权力，并由于阶级对立的尖锐化等因素而日益加强。”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时，是按这两个原则进行的，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学者。

第一章 古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是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它时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低下时，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更大。人类不只是简单地利用，而是已开始认识自然界，并不断提高利用、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但由于这种能力的低下，也会在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显得软弱而无力。因此，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比今天更依赖于地理环境。

但是，由于世界的地域辽阔，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很大。就以古代的东西方而言，古希腊、罗马处于地中海沿岸的丘陵地带，而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最早产生于大河的冲积平原。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造成建立国家的进程不同，而且导致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结构的不同。

今天，中国的版图虽然辽阔广大，在各地考古发掘发现有史前时期人类活动的痕迹，但中华民族文化茁壮成长的摇篮，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因此，几千年来，特别是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是在黄河流域。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时，有必要首先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第一节 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环境

同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起着不同的作用。这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不同的影响的缘故。社会生产力在地理环境优越性的影响下提高，能增加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使人类与周围的地理环境形成一种新关系。

众所周知，古代生活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流域的人们，他们利用冲积平原肥沃而疏松的土地，和便于引水灌溉的有利条件，以及温暖湿润的气候等优越的地理环境，早在铜石并用或青铜时代，就已获得较多的剩余产品，开始迈上文明时代的旅途。在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土壤硗瘠，丘陵地带较多，古希腊、罗马就要等到铁器时代才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这是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从事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这样，生产者除为自己生活劳动之外，而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

黄河流域，特别是其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并一直沿袭下来，是由于其地理环境最适宜原始农业的生产与发展。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西高低相差悬殊。高山、高原主要分布于西部，丘陵、平原和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方。地势自西而东的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习惯常以“三大阶梯”来概括全国地势的基本特征。

青藏高原是我国最高一级地形阶梯，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海拔4000~5000米。

青藏高原往东、往北，地势明显下降，成为第二级地形阶梯。高原的东北侧，与祁连山北麓直接相连的，是海拔1500~2000米的河西走廊；东侧从横断山以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海拔多在1000~1500米，部分高峰在3000米上下。由于阴山、秦岭东西走向山脉的穿插，使地势的南北出现差异。在阴山以北，至大兴安岭以西，为海拔1000米左右的内蒙古高原，阴山以南与秦岭之间，为1000~1500米的鄂尔多斯高原。

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和雪峰山以东，是我国地势最低的一级阶梯，即海拔低于200米的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江南地区。^①

黄河发源于海拔4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沿祁连山的东麓进入海拔2000~3000米的阿拉善黄土高原；再向北、向东，又向南，流经海拔1000~1500米的鄂尔多斯、内蒙古和山西等黄土高原；然后流经海拔500~2000米的豫西山地北麓，进入海拔200米以下，甚至低于100米的黄淮海平原或华北平原。

长江与黄河一样，也是流经这三大阶梯的，但长江与黄河流经地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长江上中游是粘结性较强的胶质土壤地区，而黄河上中游和上中游的支流流经的地区，是西起六盘山、东至太行山、北接阴山、南抵秦岭，面积约为58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是一种颗粒极为细小的棕黄色土壤，粘结性小，质地疏松，缺乏有机物，最易被流水冲刷和溶解。

远古，黄河流域属热带、亚热带雨林区，终年降雨量大，往往是大到暴雨。这样，黄河上中游的黄土，经常被雨水冲刷为泥沙，顺着千沟万壑和主要支流倾泻于黄河之中。黄河流出落差悬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三章《中国地貌特征》，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殊的黄土高原后，将这些泥沙搬运于黄河河口的海湾。

黄淮海平原即华北平原在远古是海湾，后由黄河和其他河流搬运的泥沙填平而成的。关于这一点，早在北宋时的沈括就已指出。他在《梦溪笔谈》中说：“予奉使河北，边（沿）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黄）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每）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现代科学家从甘肃兰州九洲台一带发现一级台地的河水浸蚀物，和黄河流域与黄淮海平原的地质结构，都证实了这一事实，并论证了黄河及这一平原的形成过程。在黄河形成的初期，今天的青藏高原及甘肃一带海拔很低，甘肃在当时还只是“准平原”，上面分布着发达的内流水系，而各水的流向不同。从地质结构来看，形成于距今250万年前后的第四纪。在此以前，太行山与三门峡以东的华北平原，是一片汪洋大海，泰山和一些山峰丘陵，原是海洋中的礁石岛屿。后来，在青藏高原和甘陕黄土高原上升后，在其流向不同的内流水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流向弯曲但又向东流的黄河上游。高原继续上升且成西高东低的倾向，各个段落的高低悬殊较大。这样，使今天黄河上游的流速加快，从而将其上游的泥沙冲刷流进三门峡以东的海湾。今天的华北平原即黄淮海平原，就是黄河、漳河、涿水、桑干河、滹沱河等河流，冲刷其上游的泥沙堆积而形成的。

冲刷泥沙填成黄淮海平原的，主要是黄河。最初，黄河流出豫西山地后，可能是沿太行山南麓向东北流，与从山西黄土高原流出的各条河流出山后共同形成三角洲，使地势逐步淤高，迫使黄河改道。当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今黄海方向后，黄河冲积的三